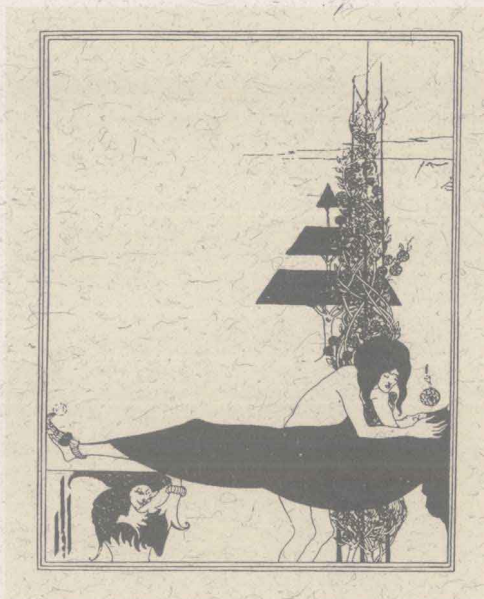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 左翼文学的时代

——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论文选

王 风 编  
〔日〕白井重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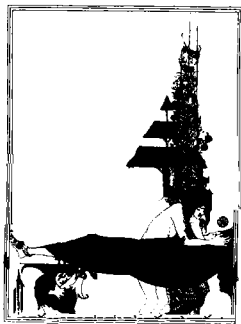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 左翼文学的时代

——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论文选

王 风  
〔日〕白井重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翼文学的时代: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论文选/  
王风,(日)白井重范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1  
(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6208-8

I. ①左… II. ①王…②白…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日本 IV. ①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0595 号

书 名:左翼文学的时代——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  
论文选

著作责任者:王 风 [日]白井重范 编

责任编辑:任 慧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208-8/I·216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12.875 印张 330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

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 “别求新声于异邦”(代序)

孙玉石

小友王风,邀我为即将付梓的《左翼文学的时代》一书写一篇序,并将编好的该书电子文本发给了我。我愉快地答应了他的盛情。

所以这样,一是因为,这本书里所收诸篇论文的作者们,多为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们大都是我熟悉的朋友。自上个世纪1980年代初叶,我与他们就开始相识、相知、相念,从学术交流,到异国情谊,多有心与心的理解和系念。这个研究会的创始者、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镇、学术大家丸山昇先生,更是我十分尊敬的挚友。书里所选研究论文,不少是我先前曾经陆续读过的。于他们的“人”、他们的“文”,我心里有一种“对得上号”的亲切感。二是因为,他们认真严肃地撰写的这些论文,从课题关注、学术视野、立论考量,到史料搜寻、论析方法、运思逻辑,都与我自己、与我中国同行们的研究范畴和习惯路数,有诸多不甚相同的新异之处。他们以自己严肃勤谨思索新颖的学术果实,给我带来了别一番新鲜的认知世界。无论是属于重读,还是最初走近,这些以辛勤汗水播下的种子,我相信,让我自己和他人所可能收获的,绝不会是大言无物的空疏和荒凉。

当怀着一种友情,也怀着一种期待,从头至尾,认真仔细读完了这本书稿的各篇文字以后,我才更为真切地感觉到,我的贸

然应允,所作的些微付出,已经获得了怎样出于我预想之外的丰厚馈赠了。

丸山昇先生关于鲁迅、关于中国 1930 年代文学,诸多精湛的研究成果,大都在陆续刊载的翻译文字、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一书中,已认真拜读过了。这里收入丸山昇先生的两篇文章:《关于鲁迅的谈话笔记〈几个重要问题〉》、《关于潘汉年·初稿——一九三〇年代群像之一》,与我读过的其他研究成果一样,依然可以显露出一个学术大家融阔大视野、缜密思维、严谨考辨于一炉的学术作风的特色来。

丸山昇先生在 1993 年发表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的周边——鲁迅的晚年与冯雪峰》一文里,曾提及这篇访问记及其发表的经过:“在基本赞成严(家炎)教授认为可以把它当做鲁迅自身的谈话见解的基础上,对应如何解读这篇文章,提出了若干不同意见。那篇文章的重点在于探讨鲁迅晚年的思考方法、特别是冯雪峰与鲁迅之间微妙却又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具有重要意义的不同,对访问记本身的检讨不是讨论的中心。本论文没有太多超出前文的内容,而是再次就访问记加以检讨,确认一些应当再确认的地方,同时对其定位加以整理。”鲁迅接受《救亡情报》记者采访谈话记录的《几个重要问题》,此次我对照当时《救亡情报》上初刊的文字、此后《夜莺》杂志作为鲁迅论著刊载的整理文章,再细读一遍丸山昇先生为鲁迅此文已经发表过的学术论文,以及这篇补充论述性的文字,于先生的学术功力和治学风采,有了一番更深的领悟。

这篇短论文字,不仅追踪性地搜寻补充了 1980 年代初严家炎先生率先论述该访问记文章之后出现的一些当事者回忆自述等重要史料,而且在肯定严先生意见的基础上,对所涉问题的疑隙,作了一些新获补充和缜密辨析。特别于鲁迅访问记所谈几个问题的轻重性质和理论意义,至访谈记中所涉最有鲁迅个性

特色的观点,都条分缕析,举重若轻地传达了自己的独特言说和按而不论的宝贵见解来。如丸山昇先生认为,访问记关于“学生救亡运动”的第一部分,对于“一二·九”以来全国学生救亡运动澎湃浪潮的感想,并未清楚表现出鲁迅自己的特色来。而第二部分关于“联合战线”的内容,诚如严先生也指出的,和鲁迅之前二三年的主张,有很多重合的地方,相当正确地传达了鲁迅的谈话。如严家炎也谈到的,反对无批判地赞颂岳飞和文天祥并警惕被这一潮流所裹挟,在1935、1936年鲁迅的文章中经常能够看到。这种意见不单来自保守一派,在萧三从莫斯科致“左联”、希望“左联”解散和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信中,也提倡“多写民族救国英雄,如东北义勇军事实,复活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痛骂秦桧,吴三桂,袁世凯……使成为革命民族战争时代的革命民族文学”,这些情形,一并加剧了鲁迅的担忧。丸山昇先生说:“我以前已经指出,与其将鲁迅反对无批判地宣传岳飞等定位为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毋宁理解为‘鲁迅对中国历史负面遗产的认识或是已化为其气质的执着信念’更为切合鲁迅的实际。”进而他重申了从中所感到的“鲁迅对193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界整体倾向的抗拒和‘寂寞’之感”。丸山昇先生认为,《夜莺》杂志所刊文章第三部分“目前所需要的文学”里的文字,才能够“特别传达出鲁迅独特的思路”。鲁迅这样说:“我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现在我们中国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机,鼓励斗争的文学作品,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丸山昇先生认为,“特别前半,正是鲁迅独有的发言”。他还引用了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发表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论述,然后指出:对政治性的否定自身在相反的意义上具有政治性特征、揭露批判者的“阶级性”,这种应对在众多倾向中十分新鲜,令人耳目一



新,而且是最直指本质的思考方式。丸山昇先生断定,这样一些“鲁迅的想法不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不见同类,包括此后,是在左翼文学中不大能见到的想法。在此意义上,这应是判断访问记相当正确地传达了鲁迅谈话的有力根据”。“这样的话,考察鲁迅晚年的时候,在承认这篇谈话笔记不收入《全集》有其根据之上,也不可小视其具有的意义。”

我读之颇有兴味的丸山昇先生另一篇论文《关于潘汉年·初稿——一九三〇年代群像之一》,是他关于中国1930年代后期创造社到“左联”成立期间相关“经纬人物”群像研究系列的成果之一,发表于稍晚的1985年3月。潘汉年于1950年代因被疑与国民党有染而突然被捕,多遭劫难,含冤死去五年之后,才于1982年恢复名誉。丸山昇先生这篇文章,是在潘汉年刚获恢复名誉两年多后写成的。这里不难看出丸山昇先生关注这个左翼文化人物一生神奇事迹和引起更深思考的潜在意图,从而也可以看出写作此文所隐含的相关“追问”带有怎样幽深“尖锐”的意义。论文开头就这样说:

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第八节《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中被这样提及:“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应当说,其一生本身便是作为一个尖锐的问题而存在的。重新追溯潘汉年这样的人物的一生,不但关涉他个人的名誉问题,而且必然与三十年来持续否定其一生的究竟为何物这一追问相关。并且,这时不能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几个个人和集团。即便弄清他们的政治、思想责任这一工作本身不可欠缺,也将立即导向对他们的这些过错予以许可、使之持续甚至时而扩大的究竟是什么这一追问。而且可以说,这一追问终究恐怕与政治的魔性、历史的讽刺、进而人的愚蠢这一类暧昧或带“观念性”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仅有一纸之隔。不过我想,对于今天的

我们而言,比起害怕陷入这种世界的泥沼而事先想定应在某处存在的“正确”观点、将问题视为对“正确”观点的偏离,更有意义的毋宁是通过执着于事实本身,探寻重审1930年代以降之历史全貌的视角。当然,我也并不认为问题可简单解明。目前本稿能做的只是大略追溯潘汉年这一人物的足迹,部分地辨明其一生的复杂性,从而对其一生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尚不完全明确的推断。

披阅此文,如读娓娓道来的一个个如歌如泣的传奇性历史故事一样,于朴实宁静的文字叙述中,让你感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事实背后隐藏的神奇惊险,惊异于一些历史事实所体现的“中国革命难以捉摸的复杂性和兴味之处”,无法揣摩历史发展走向的无限丰富和复杂,并从作者“执着于事实本身,探寻重审1930年代以降之历史全貌的视角”的追寻中,审视沉思出许多中国革命历史真实中所蕴涵之“政治的魔性、历史的讽刺、进而人的愚蠢”等观念和行为所带来的无比痛苦、复杂、兴味与血腥来。读了这些文字之后,除去惊叹丸山昇先生于复杂纷繁如一团乱麻的问题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左右自如严肃厘清的精神清醒之外,也十分感佩于他搜寻和整合历史资料所花费的功夫和心血。具有高度尊严的历史性、文学批评的客观性与寻求廓清问题严肃执着精神的统一,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丸山昇先生生动地叙述了潘汉年当年在上海,带着夏衍,与杨度这一神奇人物晤面的神秘过程。企图复辟封建帝制的“筹安会”六公子之一的杨度,当时竟作为一位秘密共产党员,一面与上海帮派头子杜月笙保持关系,一面在1930年代的上海起到无法代替的革命作用。这一事实“体现了中国革命难以捉摸的复杂性和兴味之处”,而潘汉年就在这一极端复杂的前线或焦点里长期行动。严肃的学术研究如叙述故事一样富有魔力,竟使得丸山昇先生禁不住略带感情地如是说:“产生并培育出能够履行这一任务

的潘汉年或者说这一性格的人物的中国革命,让我深感兴趣。”

写到潘汉年含冤死去的悲惨结果之后,丸山昇先生的论文是以如此“未尽之言”而又无所畏缩申明大义的慨叹结尾的:

到该写结论的时候了。可是,规定的字数早已超过。或者应该说,面对以上事实,又究竟能写些什么呢。倘若能说点什么的话,那也太多、太复杂了。现在我只能把它们都留待下次。在此至少可以确认的是:潘汉年所担当的工作是中国革命最为复杂困难的方面之一;曾经被鲁迅讽刺为“齿白唇红”的革命文学者的青年,不久便岂止是革命文学者,而是作为革命家终生献身革命,并在自身也作为重要一分子创立起来的新国家之下悲惨地死去。而我们首先应当做的,乃是不对这一切感到畏缩,或即便有所畏缩也要坚持重新加以审视。

这样一些看似颇为淡然的历史言说和学术表白,也许正是丸山昇先生作为一个“不对一切感到畏缩”这样一位严肃而有信仰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所特别具有的他人永远无法代替的一种精神魅力和历史风采吧。含着热泪读完这篇带着一种“无奈”和“抗争”心情写下的“不对这一切感到畏缩”而“坚持重新加以审视”的论文,我要在这里,对于丸山昇先生的“笔端常带感情”的学术文字,他自己和他倾情论述的对象“潘汉年们”远去的伟大灵魂,表示自己内心最深挚的敬意。

初期研究会里,与丸山昇先生一起读书的,还有一些当时就读硕士博士课程或先后已毕业的学生们。他们大多为日本“40后”的一辈。亲身感受过的生活经历,战后接受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丸山昇先生言传身教和精神魅力的辐射,他们共同对于中国当时否定1930年代文学,批判所谓“文艺黑线”的不满,驱使他们进入学术研究的关注点时,很早就集中选择了共同感兴

趣的一些问题。在努力弄清中国“1930年代文学”历史真相自觉意识的驱动下,他们又依着自己的兴味,确定了探索的学术课题,并先后做出了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成果。这辈学人中间,就有我熟悉的朋友佐治俊彦、芦田肇、近藤龙哉、小谷一郎等先生。这里读到的,仅仅是他们先期和后来陆续发表过的少数代表性的果实。

佐治俊彦的论文《文学革命论争和太阳社》,发表于1972年3月出版的《东洋文化》第52号上。他1974年博士课程毕业。论文写作时间大约应为开始读博士课程之后不久。那时候他才27岁。长他十岁的我,那时候还处在举国批判“文艺黑线”风潮笼罩的“蒙昧”之中,做着一些糊里糊涂的错事和傻事。如此不同处境下的巨大思想和精神差异,更凸显出他们拥有学术思考那份自由,带来的是怎样的学术思想的清醒和治学路数的坚实。作者在论文里,用细心搜罗的丰富史料,努力去厘清创造社和太阳社论争的复杂起因与纷繁过程。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的风暴已经将“左联”以及创造社、太阳社统统打入“黑线”而大加挞伐的气氛里,历史论争本身具有极端混乱复杂的性质,诸多被加以“黑线”罪名而噤口于往事的当事人尚无法披露真实历史文献和亲历记忆资料。可以设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完成这一研究任务,是相当困难的。诚如作者谈及论文写作意图时说的:“关于左翼作家联盟以及1930年代文艺之研究,如果能搞清‘四·一二’政变以后的混乱局势,和在该局势下展开的革命文学论争,那就可能会给该文学和文学运动的性质、问题点、成果等定下一个可供参照的大基准。因为这一时期的混乱给1930年代文艺既带来了能量也凸显了弱点。我这几年来感觉到的问题所在可能大方向没有错。但是,要对我自己的感觉反复加以实证,由于我个人能力和手头资料所限,迟迟没有获得什么进展。”“本文作为反复实证的一个部分,着眼于太阳社,以其宣告成立到‘左联’成立为止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为

线索,以期搞清革命文学论争和太阳社之间的关系。”论文对于这场论争的发生根源、缠绕经过、复杂性质以及太阳社本身的意义弱点的论析评价,深刻地理解和揭示历史所蕴涵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体现了一个青年学者所坚守的严格依据丰富坚实的客观资料,竭力走近历史的“现场”,努力去还原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真实面目的历史性原则。

芦田肇的两万余字长文《钱杏邨的“新写实主义”——与藏原惟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关系及其他》,写毕于1971年11月,翌年3月发表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重要学术刊物《东洋文化》第52号上。从论文写作时间推测,那时他还是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研究科博士课程的研究生,刚刚29岁。在本论文中,他是以“新写实主义”为焦点进行思考,作出了一些断片性的深入考察。他认为,姑且不论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这篇评论的内容、质量如何,仅从创造社与鲁迅之间围绕“革命文学”的论争,在批判鲁迅及其作品中,对文坛的“权威”鲁迅进行颠覆性的“裁判”,把鲁迅作品作为文学作品作出的仔细分析,深入作品内部进行“抨击”这一点上,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在“革命文学派”一方的文章中,是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摆脱了“评判是非”的常规思维路数,而是选择通过剖析钱杏邨所抓住的“‘与时代的对应关系’这个轴心”这一理论前提,以及与此紧密相关联的“批评原理”,来展开自己的考察论述。这样就为他对于课题对象进行坚实有效的深化研究,找到了有突破基础与拓展空间的观察视角和问题意识。从“与时代的对应关系”这个轴心,论文分析了钱杏邨1928年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里,如何判定鲁迅已经“死去”,到1930年“左联”即将成立时写的《鲁迅》一文,转变为将鲁迅视为一位“同路人作家”复活加以肯定,却又同样以“与时代的对应关系为轴心”的视点,仔细分析了钱杏邨在《茅盾与现实》一文里,如何认定茅盾从《蚀》三部曲到《野蔷薇》等作品,

在思想上怎样“做了一百八十度转变”,表现了从已有肯定到尖锐否定倒退性质的衍变过程。芦田肇的论文,批评钱杏邨“把作者的思想·立场看作是作品世界中的人物的行动·思想·心情相同的东西,并且把这一观念作为前提,对作者的立场·思想进行责难。应当要与作品或是作品世界相区别的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意识’、‘阶级的立场’被作为最重要的问题,这个看法就成了贯穿《从东京回到武汉》这篇文章的牢固基调”。论文中这样的分析评述,把握到了钱杏邨理论批评问题的核心所在。芦田肇这篇论文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他所进一步“注目的方向”,乃是对于让钱杏邨的“批评原理”发生质变的媒介是什么,即他的这些批评理论与接受日本“新写实主义”论影响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论文作者所自白的:“本论是以他的‘新写实主义’为焦点进行的”断片性的“考察”。“这里有一个事实,即1928年5月到10月这期间,在《太阳月刊》七月停刊号上,登载了林伯修翻译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我认为使钱杏邨的文艺批评产生质变的直接原因就在这里。”而林伯修翻译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原文是登载在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机关杂志《战旗》创刊号(1928年5月)上的藏原惟人的《到无产阶级写实主义之路》。一方面有一直被“宣告死亡”的鲁迅、“幻灭·动摇”的茅盾等,另一方面又有经过了“新现实主义”的洗礼,几乎在同一性质的批评原理上取得了“共鸣”的钱杏邨等“革命文学派”。“左联”是把他们都包含在一起,结成联盟在那里发挥作用的。1930年代文学正在这样的“左联”的主导之下逐渐发展下去。“新写实主义”与实际创作之间的关系,作者的立场、观点与艺术方法之间的关系,文艺技法等问题,都被放入了这个叫做“左联”的熔炉里,它们的真正意义会在这里被具体地、客观地质疑。而作为“左联”中的一个极端奇特的部分,考察钱杏邨和他的文学批评中的问题点,对于弄明白1930年代文学的一部分来说,并不是浪费时间。我联想到自己1971年在那个“万籟

无声”的时候,对于中国 1930 年代左翼文学争论所获有的被强权控制下的混沌愚昧和无知胆怯,重读同一时期里,芦田肇君这篇出于还是一位青年学生手笔之沉甸甸的学术论文,我内心里除了赞赏之外,更多了一份回顾往昔时日的沉重与惭愧交织的苍凉滋味。

近藤龙哉多年致力于胡风及其他七月派作家、“北方左联”的研究。他稍晚发表于 1988 年 3 月号《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上的《〈文学杂志〉、〈文艺月报〉与“左联”活动探赜——以“北方左联”克服“关门主义”的过程为中心》的论文,可以说是较早出现的关于“北方左联”研究的一篇难得的学术力作。中国“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自 1979 年逐渐获得自由言说空间以来,有关“北方左联”活动的回忆录陆续问世。被长久淹没的许多历史问题的重新浮现,引起了近藤龙哉的关注。他于专心阅读中逐渐发现,包括自团体名称、成立日期、成员构成,到和鲁迅发生联系的情况,许多“北方左联”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存在不少差异和出入。他曾撰写过《关于“北方左联”》等文,专门探讨这些“出入”产生的原因,并整理了种种证言,摸索接近历史实际的适宜方法。这一篇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围绕 1932—1933 年“北方左联”的方针发生对立或变化的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化的考察。针对出现的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证言的历史可信度,论文作者一方面赞同朱正先生经过严密考证作出的质疑批评,如回忆中过分肯定鲁迅与“北方左联”及与党的领导的密切关系等,但同时又对于一些回忆录的某些真实可靠性,与朱正先生的否定略有差异,采取了更为审慎的分析态度,通过就一些文学历史的事实的深入分辨,保留自己某种商榷甚至更为偏于肯定的见解。他以复杂思考和实证辨析的细密方法,通过对于当时北平抗日斗争的历史背景,《文学杂志》等几份刊物创办的编者作者的阵容,刊物所发文章的内容倾向,“左联”代表作家鲁迅、丁玲等人作品的刊载及相关消息报道的文字,以及鲁

迅书信中谈及冰莹已“与左联无关”因而不能“代为催稿”等熟悉资料的细微品读,对于《文学杂志》、《文艺月报》与“北方左联”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与社联之间因政治姿态差异所产生的可能影响等,都作出了应该说相对来看是更为缜密更为接近历史实际的论断。论者对于如何以更复杂的视点来看待过去历史,当时发表与当今刊出的诸多回忆录之可信度的复杂情况,基于历史复杂性所作认真辨析的研究方法,于反复仔细阅读论文中,我自己也获得了学术研究的某些可贵启示。

小谷一郎生于1950年,也可视为“40后”一代群体的“殿军”。1983年我往东京大学文学部任教时,小谷一郎已经是大学里的一名青年教师。他却总是每堂课不落地前来听我的讲义。他同芦田、近藤等先生,与我一起,于那年的暑期,在丸山昇先生的别墅里,一面携我游览岛崎藤村的小诸古城的故居,观览长野火山喷烟等自然景色,一面趴在榻榻米上“啃游雨读”,同读陈建功的小说《飘逝的花头巾》,然后一起在长野“春日旅馆”,参加一年一度研究会的“合宿”活动,研讨问题,交流心得。他多年里,或与伊藤虎丸先生合作,或自己独立进行,于郭沫若、田汉及创造社发展与日本之关系,以及东京“左联”旅日中国留学生文学活动史迹等方面,或学术研究,或史料编撰,颇多成绩。小谷一郎于1987年9月发表的《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及其它——创造社向左转的先声》论文中,已经简略涉及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论和与“孤军派”的关系。这里收入他1994年发表的论文《郭沫若与20年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孤军派”——论郭沫若“革命文学”论的提倡、广东之行、参加北伐的背景及其意义》,是他于相关课题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份成果。论文对于中国学者1980年代以降的部分研究论述中,把郭沫若与“孤军派”的联系完全割舍掉,似乎郭沫若与“孤军派”一开始就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样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用大量原始资料的翔实考察,作出了自己新的探论。论文谈及郭沫若早期加入丙



辰学社的原委及由此开始与“孤军社”的密切关系,分析了郭沫若认识到“孤军社”社会政治主张的“迂阔”和“怀疑”,同时在思想创作上又保持与“孤军派”的联系复杂情况,考察了郭沫若与“孤军派”思想发生决裂始于他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而此事又和与之发生论战的“孤军派”人物之间存在怎样密切关系等诸多史实。直到“孤军派”与“醒狮派”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与“共产革命”,公开打出“国家主义”旗号的时候,郭沫若如何撰文与“孤军派”论战,接近革命派瞿秋白、恽代英,终于实行与“孤军派”彻底决裂。最后郭沫若怎样走向广州参与促进“社会革命实现”的理论鼓吹,进行“革命文学”的实践。在我自己的印象中,小谷先生为人热情,朴实低调,从不张扬。读他的这篇论文后,于清晰细致梳理而又颇富理性的文字中,让我再次感到小谷先生的扎实缜密、审慎自如的研究风格,一如他的为人那样。

按照丸山昇先生带领的读书会习惯,与坚持集体阅读和讨论现代文学刊物或著述同时,参与者都选有各自研究的方向,除了围绕“左联”评价和相关论争这一主要课题之外,活动参与者或其他学生都可依据个人兴趣和研修学位的需要,自己选择与1930年代文学或多或少相关联的课题,进行独立研究,也可以逸出这个范围,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这些看似不同方面的课题做出的成果、所思考的“问题意识”,仍然都与讨论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更为深隐的内在动因——为历史求真的科学精神,或近或远地联系着。在严谨求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气上,都能体现出日本几代学人那种个性鲜明而又“和而不同”的丰富与多样来。

我初次参加的1983年夏天在长野县“春日”温泉旅馆举行的1930年代研究会的“合宿”研讨会上,除了与伊藤虎丸、尾上兼英、丸山昇、木山英雄四位“巨头”朝夕相处之外,另外认识和熟悉的稍年长者,就是自关西大阪专程赶来与会的北冈正子和